

丘濬经济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赵雨凡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0日

摘要

明代中叶, 随着社会矛盾深化和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与社会观念正经历着深刻变革。作为十五世纪的理学名臣, 丘濬以《大学衍义补》为核心, 构建了一套兼具传统底蕴与革新精神的经济治理思想。本文结合学界相关研究成果, 以丘濬“听民自为”的治理总纲为统领, 从土地赋役、商贸市场、海洋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管理五大维度系统梳理他的经济治理具体举措, 剖析丘濬思想中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辩证统一的核心特质。在此基础上, 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语境, 阐释丘濬经济思想在市场经济建设、全球化发展、财政治理、共同富裕推进中的现代价值与创造性转化路径, 挖掘超越时代的治理智慧, 为当代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市场伦理构建、内外经济统筹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丘濬, 藏富于民, 听民自为, 经济治理, 当代价值

A Study on Qiu Jun's Economic Governance Though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

Yufan Zhao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July 9, 2026; published: July 20, 2026

Abstract

In the mid-Ming Dynasty, alongside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the vigorous growth of commodity economy,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ook place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social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society. As a renowned Neo-Confucian official in the 15th century, centering on his magnum opus *Supplement to the Meaning of the Great Learning*, Qiu Jun constructed a set of economic governance thoughts featuring traditional heritage and innovative spirit. Drawing

文章引用: 赵雨凡. 丘濬经济治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4): 985-991.

DOI: 10.12677/isl.2026.104116

on relevant academic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Qiu Jun's general governance principle of "letting people conduct economic activities freely" as the guideline. It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his specific economic governance measures from five dimensions: land and taxes and corvée, commerce and market, overseas trade, currency and finance, as well as fiscal administration,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embody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laissez-faire and state intervention in Qiu Jun's ideology. On this basis, against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odern valu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path of Qiu Jun's economic though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conomy, globalization advancement, fiscal governance and the promo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t explores his timeless governance wisdom, so as to provide historical reference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ethics,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conomies.

Keywords

Qiu Jun, Enriching the People by Accumulating Private Wealth, Letting People Conduct Economic Activities Freely, Economic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丘濬，字仲深，号深庵，琼州琼台(海南)人，世称琼台先生，明代中叶理学名臣。丘濬生于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 年)，弘治八年(1495 年)病逝。丘濬一生，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死后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1]。他的一生著述宏富，留存了《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等三十余部、三百余卷著作，其中《大学衍义补》系统阐释丘濬的治国理政、经济民生思想，是研究他经济理念的核心典籍。史载：丘濬“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2]。明中已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3]，具有资本主义雇佣性质的工场手工业，代表着封建社会内部萌发的新的生产方式([4], p. 25)。但与此同时，明王朝的制度积病已久：皇室宗亲、豪强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国家税田锐减、流民四起；官府苛征商税、垄断商贸，压抑商品经济发展；长期海禁政策阻断海外贸易与南北海运漕运；银钞并行制度混乱、私钱泛滥，通货膨胀严重；财政收支无序、冗费丛生。传统经济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配社会的发展，亟需新的经济治理理念破解民生与财政难题。

2. 丘濬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核：藏富于民与听民自为

丘濬的经济治理思想体系，可归结为两大层面：藏富于民是其根本价值归旨，听民自为则是政策落地的实践原则。正如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所言：“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5], p. 241)，强调政府不应过度干预民用之细务。二者相辅相成、辩证共生，既确立了经济治理以民为本的价值立场，又厘清了政府与市场的权责边界，最终构建起“富民为根基、自主为路径、调控为保障”的系统性经济治理逻辑。

“藏富于民”是丘濬经济治理思想的根本宗旨，也是其区别于传统封建理财思想的核心特质。传统封建王朝经济治理始终秉持“重国轻民”思维，将充盈国库、巩固统治作为经济治理的核心目标，往往通过加重赋税、汲取民财的方式保障国家财政，忽视底层民众生计与民间财富积累。丘濬相信“四海困

穷，天禄永终”[6]的古训而且能深刻洞悉财货与民生、民生与国运的内在关联，明确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资财以生，不可一日无焉者也”([7], p. 197)。“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8]只有民“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封建王朝才能长治久安。他主张使民发展自己的个人经济，以取得“衣食之资”，使得个人经济得以发展，民得其养，从而巩固封建统治([9], p. 59)。

“用度之费”这一先进治理理念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源于丘濬对人性本质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知，他直言“财者，人之所同欲也”([7], p. 200)，坦然承认逐利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是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商品交易、商贸流通等一切经济活动的内在驱动力，正视并尊重民众的逐利需求、保障民众合法财富权益，是社会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核心前提。相较于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义理之说，丘濬正视财富的社会价值，将富民、利民作为经济治理的核心目标，体现了他具有进步性的民本经济思维。

在丘濬的经济治理思想中，贯穿着“富民”“听民自为”的理论线索，拿捏着收放自如的政策尺度，体现了与商品经济发展与时俱进的现实性和切合实际、务实可行的经世感([10], p. 30)。他深刻认识到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垄断和限制，给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阻滞([11], p. 1)。因此主张充分尊重民间经济自主权利，弱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他提出国家则要顺应“人情之俗”，不要干预私人的求利行为，放任私人获得和积累财富，“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其结果必然是“天下平矣”([7], p. 202)。需要明确的是，丘濬强调自由放任的同时也肯定了政府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富民阶层的社會价值，主张采取“安富”政策，“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12]。另一方面，因为“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13], p. 243)，他主张市场决定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同时，由国家控制粮食交易。丘濬的这种经济思想与现代“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强调“居安思危”“安富保富”，要求具备“全盘观念”，全局规划、切实执行，以促进商品流通、市场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11], p. 1)。

3. 丘濬经济治理思想的核心实践举措

基于“藏富于民、听民自为”的核心内核，丘濬立足明代土地兼并、商贸受限、海禁封闭、货币混乱、财政紊乱的现实困境，针对性提出五大经济治理举措，包括土地赋役、商贸市场、海洋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管理五个方面。

(一) 推行配丁田法，革新土地赋役制度

土地是古代农耕社会的核心生产资料，赋役是国家财政与民生负担的核心载体，土地制度与赋役体系的失衡是明代中期民生困苦、税源流失的核心根源。明代前期以来，大官僚、大地主疯狂兼并土地并隐匿田产以逃税，导致国家税田锐减、赋役不均，失地农民沦为流民，而明王朝的高压镇压与“勘籍互保”等制度又激化了矛盾，最终引发流民起义、社会动荡，使土地问题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突出问题([4], p. 25)。针对这一积弊，丘濬在听民自便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了对土地兼并有所控制的人地管理论——“配丁田法”([4], p. 27)。所谓“配丁田法”，就是规定一个期限，在这个期限之前“不追咎其既往”，“其民家所有之田，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在这个期限之后“惟限制其将来”“以田一顷，配丁一人，当一夫差役”([4], p. 27)，从制度层面破除豪强阶层的赋役特权，扭转赋役不均、贫富失衡的社会弊端。丘濬的“配丁田法”试图限制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表明他虽作为朝廷官员却不能一味维护既得利益，且“不咎既往”实为减少推行阻力的策略之举，值得肯定。该主张反映了一般富户、中小地主及商人维护田产的要求，并继承了历史上的“平均地权”人地管理论([4], p. 27)。然而，配丁田法既不能抑制兼并，也不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一方面，“不咎既往”保留了官僚大地主继续扩张的实力；另一方面，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农民根本无力买田。更重要的是，借助行政、法律手段只能维护地主大商的私有财产，

无法根治土地兼并。

(二) 倡导民自为市，重塑商贸市场秩序

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治理政策，明代前期延续这一治理思维，官府严格管控各类商贸活动、垄断核心商品贸易、随意增设商税，极大压抑了民间商贸活力，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丘濬突破传统重农抑商的思想桎梏，积极倡导“民自为市”的市场治理理念。他明确提出，“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同时，丘濬认为如果官府参予进出，“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5], p. 241)。他也不赞成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他认为，“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5], p. 247)。从上述方面我们可以看出丘濬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态度。

(三) 主张开放海禁，构建全域流通格局

明代前期为防范沿海倭寇侵扰、杜绝民间私通海外，长期厉行严苛的海禁政策，严令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与南北海运流通，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沿海治安，但也导致沿海商贸停滞、内外物资流通受阻，错失了海洋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严重制约了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国家商贸体系的构建。丘濬突破封建王朝封闭保守的治理思维，提出开放海禁、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主张。他认为海洋贸易是拓展市场边界、流通内外物资、积累社会财富、盘活沿海经济的重要路径，开放民间海外贸易，能够“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5], p. 243)；他“视前代算间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5], p. 243)。同时，丘濬秉持“有序开放、规范管控”的辩证思维，反对盲目开放与无序贸易，主张官府在开放海禁的基础上，完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规范跨境贸易流程、建立通关核查机制、强化海外贸易监管，在保障民间海外贸易自由的前提下，有效规避贸易风险、防范海外隐患、规范贸易秩序。这一思想打破了明代闭关锁国的固化格局，构建起“内外联通、开放有序、全域流通”的商贸发展体系，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具有进步性与前瞻性的对外开放理念，为后世海洋贸易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四) 革新货币制度，构建稳定流通体系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核心载体，稳定的货币体系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基础。明代前期长期实行银钞并行的货币制度，由于缺乏统一的货币管理规范，出现币种繁杂、币值混乱、购买力不稳、民间私铸货币泛滥等诸多乱象，严重扰乱市场交易秩序，加剧通货膨胀问题，制约了商品流通与商贸发展。针对明代货币体系的突出弊病，丘濬提出了三点措施来调节货币流通：一是严控货币发行主权，明确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家专属，严厉禁止民间私铸、滥发货币，杜绝私钱劣币扰乱市场秩序；二是统一货币形制、规格与价值标准，稳定货币购买力，保障各地货币流通统一、交易公平，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三是适配商品经济发展需求，实行银、钞、钱三币并行的方案，主张“宝钞铜钱，一权之以银”，确立白银的主币地位，还制定举措保障纸币购买力，以此化解长久以来的币制乱象([9], p. 62)。没有人能超脱所处时代的限制，丘濬对于货币的认识理解也有着我国传统社会货币思想的印记；不同的是丘濬在继承前人的货币思想的基础上极力挖掘货币的本质、职能等多方面内容，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使得他对于货币的认识有了近代货币思想的光彩[14]。

(五) 优化财政管理，践行节用富民理念

财政治理关乎国家存续与民生福祉。针对明代中期奢靡成风、冗费泛滥、赋税苛重、国空民穷的财政乱象，丘濬秉持“藏富于民、为民聚财”宗旨，确立节用富民、公私兼顾的财政治理理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围绕公私财税分离、国家预算、健全会计审计及优化漕运体系，提出一系列制度化财政治理主张。

其一，公私财税分离。他主张分设外府、内府，外府储赋税以供军国之用、备灾荒不测，内府储专项

收入以供皇室开支,明确“断不可以军国之储以为私奉之用”。他赞同杨炎国库独立、大臣理财的制度,认为“以大臣以道佐君,得以相可否,辨是非,而为上之人所严惮。故人君有非义之取,非礼之用,不急之为,非徒不敢擅取,而私用之抑且为之中止而潜销者有焉。苟以中人(即宦官)主之,则上之人平日相与褻狎私暱,凡不可语人者,皆可与之谋而为之矣,况彼小人无深识远虑,委曲奉承上人之不暇,且人微言轻,又安敢逆上意哉?”([15], p. 233);同时他对宋朝“积财于内库”,却持赞成态度,因为宋太祖、太宗、神宗三帝“积财于内库者,非以为己私也,盖储之于内以防外之汎用,一遇有军旅饥馑则以资之,使不至于临时厚敛以害民焉”([15], p. 234)。

其二,重视国家预算。丘濬推崇古法预算制度,主张“今日制国用,亦宜仿此法”,提出每年冬十月至十二月,由户部统筹内外钱粮、仓储、赋税及灾欠蠲免情况,核算来年用度、储备盈余,秉持量入为出原则,做到国用可考、事前预备、有度节流([16], p. 317)。

其三,健全会计审计。他倡议恢复计相制度,专设官员总理国计、稽核收支、统筹漕运仓储([16], p. 317)。主张分开司书记账、司会审核职权,“二者之职交相参互,以此斯掌,稽彼所录,多寡虚实昭然”([17], 以此防范官吏奸欺;同时建议编纂历代财政会计录,梳理各项收支数据,为国计调控提供依据。

其四,优化漕运体系。针对明代直运弊病,他主张,“为今之计,宜如刘晏之法,所运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浅涩,暂舁岸上,过浅而复舁归舟,或分载小舟以过浅,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沉溺,捞而出之,不致全失,纵有浥烂,亦可他用也。”减少漕粮沉溺损耗与官军负担;提倡河漕与海漕并行,促进商品流通,达到“南货日集于北”,而“北货亦流于南”的效果;同时他提出,“于都城之东,官路之旁,择便利处再辟新路一道或两道,每道约广十丈以上,其旧道专为官民往来之路,止行小车,其新开者一道专以通行辇运……又于中道设一提举司……专一修理道途……又俾有司拘集车户及牙行人等,从公量定脚价……永为定例。……其视开河之费,减数十倍。”[18]来改良通州至京师陆路运道,规范道路规制、运费标准与运维制度,低成本提升漕运效率、减轻运输负担。综上,丘濬的财政思想以节用富民为核心,以规范制度为支撑,构建了收支有度、公私兼顾、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治理体系。

4. 丘濬经济治理思想的当代创造性转化与时代价值

(一) 契合市场经济治理逻辑,赋能市场活力释放

丘濬“听民自为、适度调控、辩证治理”的核心思想,契合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核心治理逻辑,为新时代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市场治理体系提供了传统智慧支撑。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公共治理作用,这与丘濬反对“夺富与贫”,保护有田的富民、“乘时贵贱”、“居货待价”的商人的做法一脉相承[19]。丘濬针对粮食、民生物资等关键领域、核心产业的精准调控思维,对应当代政府宏观调控、稳定市场秩序、保障民生供给、防范市场失灵的治理举措。对丘濬这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充分释放民间经济内生动力,同时筑牢民生安全与市场稳定底线,推动市场经济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二) 适配全球化发展趋势,提供对外开放智慧

丘濬反对对自然经济维护者排斥、压制商品经济,主张尽力扩大商品流增强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20] p. 4),是中国古代对外开放思想的宝贵财富,为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经济全球化时代,封闭保守必然落后,开放互通方能兴盛。丘濬认为:明政权施加给对外贸易的禁制,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利之所在,民不畏死”([12], p. 242),不如干脆废除禁制,允许百姓出海贸易以求利,而由国家制定有关制度法规,进行管理,并照章征税,于国于民,两俱有利([20], p. 5)。新时代可充分革新他对外贸易的积极态度,在坚持自主可控、安全稳定的前提下,持续拓展

对外贸易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国际贸易合作，依托对外开放激活经济发展新动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三) 创新传统货币理念，助力现代金融秩序建设

丘濬强调“一准上市为权之”、“一权以银”、“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交易依靠“宝钞、铜钱通行上下”^[21]。这与当代稳定货币币值、规范金融市场运行、健全货币调控体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治理理念契合。对他的货币金融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能够为我国完善现代法定货币制度、健全宏观金融调控体系、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推动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历史参考，助力构建稳健、有序、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

(四) 传承审慎理财思想，赋能共同富裕建设

丘濬“人人各得其分，人人各遂其愿，而天下平矣”的财政民本思想，与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深度契合，为扎实推进全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治理底蕴。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是缩小贫富差距、优化财富分配、保障全民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发展成果普惠于民，而丘濬的审慎理财思想始终坚持富民为本、民生优先，反对国家过度敛财、体恤底层民众疾苦，主张均衡公私财富分配、夯实民生发展根基。新时代传承并创新其富民理财理念，能够为优化财税分配制度、完善民生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供理论借鉴，指导经济发展、兼顾效率与公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财富合理分配、全民共享，稳步推进全民共同富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与民生幸福提升的有机统一。

5. 结语

综上所述，丘濬立足明代中期的社会经济困境，以《大学衍义补》为核心载体，以“藏富于民”为价值宗旨、以“听民自为”为实践准则，构建了涵盖土地赋役、商贸市场、海洋贸易、货币金融、财政管理五大领域的全方位、系统化经济治理思想体系。丘濬在论述经济问题时，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多是先秦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所运用的概念、范畴，也多是传统的概念、范畴。但是，他却在旧形式下，表达了符合那个时代发展趋势的新思想^[8], p. 59)。有效回应了明代中期的经济社会危机，推动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度挖掘丘濬经济思想的核心精髓与治理智慧，能够持续为我国市场经济提质增效、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现代金融秩序完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提供丰厚的历史滋养与理论支撑，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跨越时空的时代价值与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李东阳, 等. 明孝宗实录[M]//明实录(附校勘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775.
- [2] (清)张廷玉, 等. 明史: 卷一百八十一《丘濬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 顾秉谦, 等. 纂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校勘. 明神宗实录: 卷三百六十一,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 [4] 郑绍增. 论丘濬的经济管理思想[J].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2): 25-29.
- [5]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五《市余之令》[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6] 杨伯峻. 论语译注: 《尧曰》第二十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7]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上》[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8]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一《总论朝廷之政》[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9] 石世奇. 论丘濬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6): 61-67.
- [10] 展龙. 丘濬“藏富于民”的经济治理思想[J]. 今日海南, 2023(11): 29-30.
- [11] 邱仁义. 经世致用忧民生[N]. 海南日报, 2021-12-13(B04).

-
- [12]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十三《蕃民之生》[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3]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六《铜楮之币上》[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4] 刘志丹. 丘濬货币思想新论[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安徽大学, 2012.
- [15]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四《经制之义下》[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6] 齐海鹏, 孙文学. 丘濬的财政思想分析[C]//财政史研究(第四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 303-320.
- [17]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三《制国用·经制之义上》[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8]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三十四《制国用·漕挽之宜下》[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
- [19] 王贤辉. 明朝理财家丘濬[J]. 产权导刊, 2010(5): 80.
- [20] 赵靖. 丘浚——市场经济的早期憧憬者[J]. 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1): 3-7.
- [21] (明)丘濬. 大学衍义补: 卷二十七《铜楮之币下》[M]. 林冠群, 周济夫, 点校. 北京: 京华出版社, 1999.